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期刊导航-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藏学

## 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枢纽及其古代文明

兼论茶马古道的早期历史面貌

作者：石硕 撰写时间：2003-08-09 15:04:40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指历史上藏、汉之间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这条交通要道始于卫藏，沿雅鲁藏布江东行，经林芝抵达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枢纽——昌都。自昌都起，茶马古道分成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是自昌都折向南，沿澜沧江和金沙江河谷南行，经今察雅、芒康、德钦、中甸进入到云南西部产茶区。川藏道则分南、北两条支线：北线以昌都为起点，经江达、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抵达今康定，由康定进入今雅安一带产茶区；南线亦以昌都为起点，向东经今察雅、左贡、芒康、巴塘、里塘、雅江抵达康定，由康定进入雅安一带的产茶区。

从史籍记载看，藏、汉茶马古道的开通应始于唐与吐蕃交往时期。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时，吐蕃已出现了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者饮用”，且对各种类型的茶已有所了解 and 区分，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知识的书，名为《甘露之海》。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和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两百余年，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且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信的。

不过，藏、汉之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分裂时期，此时饮茶的习俗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藏、汉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藏、汉之间的茶马贸易至明、清时代臻于极盛。茶马贸易不仅成为联系藏、汉之间的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连接藏汉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政治纽带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密切和加强明、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乃至藏、汉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藏、汉之间通过茶马古道而进行茶马贸易开始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和政府角色虽开始逐渐淡出，但是藏、汉民间的茶马贸易却始终活跃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代。

### 二、一份敦煌写卷所反映的茶马古道的早期历史面貌

分类检索

- 经济
- 民俗
- 宗教
- 艺术
- 医药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社会
- 交通
- 学术
- 藏学
- 传媒
- 人物
- 教育
- 体育
- 科技
- 政法
- 语言
- 书评
- 环保
- 文化

起自西藏，经昌都而向南通往今云南西部产茶区和经昌都而向东通往四川今雅安一带产茶区的茶马古道虽开始于唐宋时代，但这条道路本身却并非是在唐宋时代因茶马贸易才被人们发现和利用的。事实上，这条道路开通利用的历史极为久远，从史料及有关史实线索来看，可以说，至少从距今4-5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这条道路就已经被古代人类所开通和利用，并成为今川、滇、藏三地之间远古氏族人群迁徙流动及三地间文化传播的重要孔道。

在现存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异常珍贵的记叙藏地远古时代“恰”和“穆”两大氏族进行通婚和使者往来的文献，此即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 II。这份文献是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通常为非佛教内容写卷所采用的比较潦草的字体写成，现存63行，行文较为古朴，其内容是记叙“恰”的使者去到“穆”的地方，请求信奉“穆”人的宗教并接受“穆”人的统治，受到“穆”王的盘问。值得重视的是，这份古藏文写卷在记叙“穆”与“恰”两大氏族关系时一开始便写道：

“远古之初，辟荒之始，‘穆’与‘恰’联姻时代，‘恰’之使臣到了‘穆’之地界。”

可见，远古时代“穆”、“恰”是相互联姻的两大氏族。在藏族的传说与记载中，“恰”是吐蕃赞普王族所出之氏族。吐蕃时代留存的《工布第穆刻石》记：“最初，恰·雅拉达楚之子中的聂赤赞普为做人间之主而降到神山降多……”。据敦煌古藏文写卷和本教文献记载，“恰”的地理位置应在今西藏腹心地区，褚俊杰先生也认为“恰”最初的位置应在今天的后藏一带，后来逐渐迁到雅隆河谷。

那么，“穆”的地理位置何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II记载，当“恰”的使者抵达“穆”地方并受到“穆”王的盘问时，“恰”的使者有如下一段回答：

“我们是从下藏河头来的，迷了路，山谷险峻，河滩宽阔，曾遇到过人，那人头发是赫色的，眼睛是黄色的，声音嘶哑，手脚向里窝卷，他问我们：‘你们是谁的属民？’我们如实作了回答，说：（我们）‘是到‘穆’国去的‘恰’的使者。’他说：‘如此你们便是走错了路，这地方是恶鬼之地，而‘穆’国是在东南边。’说着便给指路。就这样（我们）到了‘穆’国地带。”

这里明确提到“穆”是在“恰”的东南方向。从“恰”使者称“我们是从藏河头来”，说明其前往“穆”的路线当是顺河而下。既然“穆”是在“恰”之东部，而其使者行进方向又是顺河而下，那么其所趋向的地区显然应该是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从“恰”使者前往“穆”地途中经过了“山谷险峻，河滩宽阔”之地，并“遇到过獐子虎豹，也遇到过熊和马熊”等环境描述来看，均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吻合。此外，关于“穆”所处之环境，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II中还有以下两则重要记载，一则曰：

“‘穆’氏说：‘吾之‘穆’地。尊崇喜乐天神而早无破晓，温暖阳光照耀而晚无黄昏。此地山崖尽头有岩石环绕，苍天尽头也有界绳环绕，高处鸟禽无以飞越，低处鼠类不能钻过。’”

另一则是“穆”王对“恰”使者进行盘问时的一段对话：

“‘穆’王说：‘我们这个邦国中，在边界达昌赤古塔（虎关万道弯）地方，有许多獐子、虎及豹、熊、马熊等。所有这些，只要遇到一种（就过不来）。若你们从天上飞来，（你们却）没有翅膀，若从地下钻来，（你们却）不是鼠类。你们的话中谎话太多，还是回去吧！’使者回答说：‘我等小人丝毫没有狡诈诡计，在‘穆’王（所说）的虎关豹关之地，遇到过獐子虎豹，也遇到过熊和马熊，（但我们）遇到山口则交过山费，遇到人则交过酬劳费，所以（他们）为我

们指路，这样才能到达‘穆’王跟前。”

从以上两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穆”所处的地理环境当在地势险峻之地，即所谓“高处鸟禽无以飞越，低处鼠类不能钻过”。同时记载中提到，“穆”地“早无破晓，温暖阳光照耀而晚无黄昏”，从这一描述看，“穆”地当是处在山谷险峻及峰峦遮蔽的河谷地带，因为只有这样的峡谷地带才符合“早无破晓”、“晚无黄昏”的条件。此外，从“温暖阳光照耀”一语，说明其地日照强烈但气候较为寒冷，当为高原之地。另从“穆”王与“恰”使者的对话中，反映出从“恰”到“穆”的地界不但路途曲折、遥远（以至“恰”的使者迷了路），而且要经过许多山口，道路极为艰险，正如“穆”王所言：“我们这个邦国中，在边界达昌赤古塔（虎关万道弯）地方，有许多獐子、虎及豹、熊、马熊等。”“达昌赤古塔”地在何处已不可考，但从“穆”王所说在由“恰”通往“穆”地的属于“穆”的边界地方，要途经所谓“虎关豹关之地”，该地有“有许多獐子、虎及豹、熊、马熊等”来判断，这个所谓“虎关豹关之地”，很显然是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更确切的说，应是指今天的藏东和藏东南地区一带。在以上所列几种动物中，我们姑且撇开熊和马熊（棕熊的一个亚种）不论，仅以虎、豹獐子这三种动物可大体确定所谓“虎关豹关之地”的位置。

以虎而论，虎在青藏高原地域属极为少见之珍稀动物，且种类只有孟加拉虎一种，其分布仅见于西藏东南部地区即今天林芝地区墨脱和察隅一带的常绿阔叶林中。考虑到古代藏东地区的气温要较现在温暖，当时虎的分布也可能向北延伸到波密一带。所以，从虎这一动物来判断，“穆”之边界的“虎关豹关之地”当在今天的藏东南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藏东南地区一带也恰好是豹和獐子这两种动物的主要分布地区。豹在西藏亦属少见之珍稀动物，西藏的豹主要有雪豹、金钱豹和云豹三种，然三者都仅分布于藏东及藏东南地区：雪豹分布于藏东及藏东南山地暗针叶林或常绿阔叶林中；金钱豹分布于藏东及藏东南针阔叶混交林中；云豹则分布于波密、察隅、墨脱针阔混交林带和常绿阔叶林中。獐子，学名为麝，麝在西藏虽非珍稀动物，但其分布同样也仅限于藏东及藏东南一带。西藏的麝主要有马麝和林麝两种，马麝分布于西藏东南部的山坡灌丛草甸和针叶林地带中；林麝则分布在察隅、波密、芒康、左贡等地的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中。

由此可见，由于虎在青藏高原的分布仅限于西藏东南部地区，而豹和獐子这两种动物在西藏的分布也同样限于藏东及藏东南一带，所以由此来判断，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 II中提到“恰”的使者前往“穆”地时所途经的同时存在虎、豹、獐子等动物的“虎关豹关之地”，显然应是在今天的藏东及藏东南一带。事实上，这一方位也正好与“恰”使者所称他们是从“河头来”相吻合。因为既然“穆”是位于“恰”的东南方向，那么“恰”使者前往“穆”的路线就必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或其支流尼羊河向东行进，趋往藏东和藏东南一带。这一沿河道向东行进的路线不仅是历史上沟通西藏与川西高原的主要通道，也是今天作为川藏干道的川藏公路的南线，是川藏之间最直接和最可通行的一条道路。不过需要指出，从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II的记载看，位于藏东及藏东南一带作为“穆”之边界的“虎关豹关之地”，显然只是“恰”使者前往“穆”之地界的一个途经之地，而并非其目的地。“恰”的使者显然是经由这一地带继续向前行，最后才到达了“穆”王居住之地。而由藏东南、一带继续前行，自然即进入到了今天的川西高原地区。所以，由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 II所反映的“恰”使者的行进路线和方位来判断，“穆”之地界以及“穆”王居住之地当主要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一带。

对于“穆”的位置是在横断山区一带的事实，法国学者石泰安先生的从语义学和古地名途径所进行的研究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在今四川松潘县境内有“毛尔盖”（dmu-dge，“dmu”的藏文音读作“穆”）的地名；在今西宁附近宗喀地方有穆苏（mu-zu）家族；在今四川丹巴县东北有一嘉绒（金川）本教神山叫穆尔多山（mu-rd.或mur-rdo）；在西宁河下游有一

条河名穆日河 (dmu-ri-chu )。这些广泛存在于青海以南至川西高原一带的含有“穆”的地名、山名、河名和族名等地名学材料，也证明“穆”氏族最初的地理位置应在今天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朵康川一带。

关于“恰”是在今西藏腹心地区而“穆”是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之地这一点，我们尚可从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26II中记载的另一个事实得到印证。据该写卷记载，当“恰”的使者来到“穆”地时，首先被“穆”的仆人发现，呼喊道：“有几个木桩般大的小人、黄羊般大的小马过来啦！”在穆王对他们进行盘问时，“恰”的使者始终以“我等小人”自称。可见，在“穆”人眼中，“恰”人以个头矮小为特点，且此特点亦为“恰”人自己所认同。自然“恰”人的矮小在这里显然是相对于“穆”人而言，它说明与“恰”人相比，“穆”人的体格要普遍高大。本世纪初，戴烈斯勒 (F. Delisle )、杜纳尔 (W. Turner)、莫仁德 (Morant) 三位外国人类学者曾先后对60多个藏族人头颅进行过测量和研究，根据测量结果，他们把藏族人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藏A型和藏B型。藏A型又称“僧侣型”，其特点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小；藏B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其特点是长头型，面孔相对窄，身材较为高大。并认为康区即今天的横断山脉地区是藏B型的故乡，藏A型则以卫藏地区为代表。此研究结果与藏人的实际情况相符。即便在今天，康区一带（主要为横断山脉地区）的藏人体格也普遍较卫藏地区要高大。戴氏等人的研究结论乃是依据本世纪初的藏人体质材料作出的，而在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向康区扩张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卫藏与康区两地居民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混血。因此可以断定，在藏族传说中的所谓“远古之初”，两地居民在体质上的差异要比今天更为突出和显著。因此，从“恰”人个头矮小而“穆”人体格高大这一点，也足以印证“恰”为卫藏地方之氏族而“穆”应为朵康即横断山脉地区之氏族。

1, 2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网站声明](#)

[合作加盟](#)

[频道导航](#)

[广告服务](#)

[人才招聘](#)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版权所有

Copyright© China Tibet Information Center

E-mail: webmaster@tibet.cn Tel:010-58336000

京ICP证 041074